

# 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之反思<sup>\*</sup>

## ——读杜甫《兵车行》与《前出塞》

□黄桂凤

(玉林师范学院 中文系 副教授 文学博士, 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对于杜甫之《兵车行》与《前出塞》,人们多以其讥玄宗之“穷兵黩武”。本文从三个角度阐述玄宗并非“穷兵黩武”:从史料证明玄宗之打吐蕃是不得已,派哥舒翰是以胡制胡,而府兵制之破坏由武则天始到张说之提议,并非全为玄宗之罪。本文从更深更广的角度了解盛唐时期之边关战争,从某一角度反思唐朝由盛转衰的前兆。

**【关键词】**穷兵黩武;哥舒翰;府兵制;《兵车行》;《前出塞》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71(2007)06-0072-05

### The Query to “Use All one's Armed Might to Wage Wars of Aggression” of Tang Xuan Zong(one of emperors of Tang Dynasty)

——reading Du-Fu's *Soldiers Vehicles* and *Former Go out of Frontier*

HUANG Gui-f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Doctor,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Abstract:** Concerning to Du-Fu's *Soldiers Vehicles* and *Former Go out of Frontier*, many people think they satirized the “use all his armed might to wage wars of aggression” of Tang Xuan Zong. The article explained the theme from three angles that Tang Xuan Zong didn't “use all his armed might to wage wars of aggression”. The historical data proved Tang Xuan Zong had to launch the wars to Tu Fan (on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ang Dynasty); The aim of Ge Shu-han being appointed the commander-in-chief was utilizing minority nationality to control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Soldiers started to be damaged by Wu Ze-tian (female emperor in Tang Dynasty) who accepted Zhang-Yue's proposal; Tang Xuan Zong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be blamed. So we ought to understand the Frontier Wars during the most prosperous period of Tang dynasty from deeper and wider angle, and ponder the omen of age flourish to decline.

**Key words:** “use all one's armed might to wage wars of aggression”; Ge Shu-han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 Soldiers; *Soldiers Vehicles*; *Former Go out of Frontier*

\* 广西教育厅 2006 年自筹经费课题。

对于杜甫《兵车行》，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杜臆》：“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民苦役而作，是也。此当作于天宝中年”。<sup>[1]</sup>《前出塞》则评曰：“云赴交河，《后出塞》云赴蓟门，明显两路出兵。考唐之交河，在伊川西七百里，哥舒翰征吐蕃时事。诗亦当作于此时，非追作也。”<sup>[2]</sup>今人也都说：“杜甫讽刺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sup>[3]</sup>“《前出塞》是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伐吐蕃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黩武”。<sup>[4]</sup>

一直以来，杜甫的《兵车行》和《前出塞》都被人认为是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因其好大喜功。我对此却心存怀疑，难道真有人以打仗为乐的？杜甫诗的本意可能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杜甫的民族观决定的。那对于唐玄宗派哥舒翰去打吐蕃，该如何认识呢？

## 一、对吐蕃作战的必要性

唐朝虽号为一统天下的大唐，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地完全统一。“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sup>[5]</sup>唐初兴时，“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sup>[6]</sup>当时唐王朝用羁縻制来管理西夷，这些羁縻州府有很大自主权，首先是爵位世袭，那就意味着朝廷不能干涉；其次“贡赋版籍”也“不上户部”，也就意味着交不交赋税，朝廷也不知道，也管不着，那“边州都督”就是一个小皇帝了。只因为其为孤立的一个府州，无法与中央抗衡而已，否则，可能早就“战国七雄”了。如果这些小小的独立王国一直和平共处，而唐朝中央政权还要去打它，凡打仗必有死伤，那可真就是“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羁縻州“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sup>[7]</sup>比如，南诏就要造反，南诏存留下的《德化碑》叙述其首领阁罗凤与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关系破裂时，狠狠地数落了唐王朝，列出了南诏不得不反唐的六大理由，简直是一篇檄文。而这其中谁是谁非，此文不予讨论。而专论吐蕃当时之行为。

《新唐书·吐蕃传》载：“唐兴，四夷有弗率者

（注：即不愿归顺的），（唐王朝）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唯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赞普（注：吐蕃最高首领）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馘华人，谋夫虎帅环视共计，率不得要领。”<sup>[8]</sup>可见当年吐蕃虽为羁縻州，但它根本也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杀人无数，直逼京城，整个唐王朝对此亦无计可施。

本来在唐太宗时，由于国力强盛，趁突厥有天灾内乱，据记载：“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注：即突厥），……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sup>[9]</sup>于是太宗发兵打突厥，取得了胜利，那时吐蕃无法与别的外族相联合，收敛了不少。当时太宗为保关中安宁，曾设边防四镇。哪想到“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sup>[10]</sup>一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又诏王孝桀（等）击吐蕃，大破其众，更置安西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sup>[11]</sup>当时还有人议论要放弃这四镇，但崔融马上反对，如果放弃四镇，吐蕃必与南诏相连，唐王朝形势就很危急了。本来在唐初兴时的四个不归服之州其一为云南，即南诏，但南蛮与吐蕃的关系，正如唐代的韦皋所说：“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sup>[12]</sup>当时“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sup>[13]</sup>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唐王朝苦守四镇，而吐蕃时时又想夺之，以便与南诏联合，这样的持久战唐王朝必吃亏，所以打吐蕃势在必行。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说：“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己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sup>[14]</sup>这是很有道理的。朱东润先生也说：“盘踞九曲，造成吐蕃可以攻，随时截断河西走廊，孤立安西四镇，威胁秦川，动摇李唐王朝的形势。”<sup>[15]</sup>而且，“吐蕃的战略是谋取四镇，控制西域，占领河陇，进兵关中，与高丽遥相呼应”。<sup>[16]</sup>所以打吐蕃势在必行。毫无理由去攻打一个独立的国家或一个民族，那是“黩武开边”，在“不容己”，为保自己国家民族或政权稳固而打仗，应该不算“穷兵黩武”。

## 二、派哥舒翰的别无选择

其实，唐王朝之征讨四夷，在太宗时已开始，比如打突厥。但为什么那时人们不说：“武皇开边意未已”呢？太宗与玄宗征讨四夷形势上有点不同：一是

派将领不同。二是兵制不同（也就是国家实力不同）。三是敌方有无可乘之机。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三个方面太宗时占了有利时机，当时突厥有天灾内乱（上文已述，此不赘述），至于第一方面，太宗当时派大将李靖去讨突厥，此为汉将。而玄宗派哥舒翰打吐蕃，这是蕃将，是不是蕃将就不重视人的性命呢？难道当时汉将已经无人可派了吗？这就关系到唐代兵制的变化了，这一点容后再论。原本汉人与胡人的战斗力就有很大悬殊。《旧唐书·东夷传》就记载这么个事情：“献诚授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授中，则天尝内出金银宝物，令宰相反南北卫文武官内择善射者五人共赌之。内史张光辅先让献诚为第一，献诚复让右玉铃卫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又让献诚。既而献诚奏曰：‘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sup>[17]</sup>由此可见，当时汉官就是比不上蕃将。而哥舒翰就是一个胡人，据《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母尉迟氏，于阗之族也。”<sup>[18]</sup>当时蕃将出名者还有安禄山，但：“禄山已得布思之众，则兵雄天下”，<sup>[19]</sup>玄宗对他有所忌讳，而“哥舒翰则其先世虽为突厥部落酋长，然至翰之身已不统领部落，失其酋长之资格，不异于寒族之蕃人。是以玄宗亦视之与安禄山相等，而不虑其变叛，……由是言之，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领之诸种不同部落也。”<sup>[20]</sup>因为这一次是打吐蕃，为了势均力敌，阿布思之众已大部分被安禄山牵制，派哥舒翰率领各种不同的兵力联合打吐蕃，以胡制胡，或许取胜机会更大。

而且当时李林甫为相，为了“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玄宗）以为然，……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sup>[21]</sup>高仙芝当时镇守安西四镇，<sup>[22]</sup>自然分身无术，这样，哥舒翰别无选择地成为攻打吐蕃之大将了。

### 三、府兵制之破坏

杜诗云“边庭流血成海水”，在当时大概是事实。仗是要打的，将领也派了，为什么牺牲这么大？即上文所讲的第二方面，兵制不同，敌方形势也不同。玄宗时，吐蕃并不弱小，它的强大一直持续到懿宗大中时，因吐蕃天灾人祸，<sup>[23]</sup>唐王朝才把它消灭

了。而在玄宗时，吐蕃以有利的形势反击大唐，天宝八载六月，唐玄宗“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橐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番诺罗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sup>[24]</sup>以几万人去打四百人尚且花这么长时间，一是敌方地利，易守难攻，二是唐王朝兵战斗力差。这由于唐朝府兵制之破坏。

唐朝兵制本来袭隋。《文献通考》载：“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伟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sup>[25]</sup>这说明，隋朝时的兵制是兵农不分，农民忙时种田，闲时训练，打仗种田两不误。《新唐书·兵志》上说：“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府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sup>[26]</sup>可见唐以来，兵农不分，打仗有专门部队，闲暇可种田，这一来减轻农民负担，二来也让士兵有所依附。

到武则天时，大用文士，边将得不到重用，府兵制因而破坏。玄宗时愈演愈烈，“自开元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彍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私，祸乱自生！”<sup>[27]</sup>真是一语中的！这些长征兵训练不够，去打仗也是送死。作为一个鲜明例子，《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士卒死者六万人。”<sup>[28]</sup>这当然会“流血成海水”！杜甫说的一点也不假。

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sup>[29]</sup>但是，从高宗、武则时期起，“随着均田制的逐步破坏，府兵制也随之遭受破坏。”<sup>[30]</sup>正因如此，“兵源越来越困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至开元年间，发展得更为尖锐。”所以，“募兵的实行，标志着府兵制度的彻底破坏”。<sup>[31]</sup>张说之提议“募兵”，实是迫不得已。据《通鉴》载：“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玄宗）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民

之分,从此始矣。”<sup>[32]</sup>虽然有说:“唐养兵之弊始于张说,”<sup>[33]</sup>其实唐王朝当时之实况,张说之建议实迫不得已。《新唐书》载:“(天宝)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sup>[34]</sup>《通鉴》亦载:“府兵日益堕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sup>[35]</sup>

综上所述,一、唐玄宗之打吐蕃,并非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二、“边庭流血成海水”有多种原因,也并不仅是“黩武”,主要不是“黩武”。三、杜甫的指责与他的民族观相关,他大概希望各民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不动兵戈。所以凡看见流血战争,百姓死亡他都会痛心疾首的。这并不是批评杜甫之“爱民”,而是为其“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定已”下一注解罢了。四、当时很多人并不以为“四夷”是大唐的,虽则有羁縻州之形式,但人们多以为“四夷”仍是“唐”之国外而非国内之族。如神功之年,狄仁杰曾上疏武则天:“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笔者加横线),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笔者加横线)也。”<sup>[36]</sup>狄仁杰即认为四夷均为唐之外而非唐之内的,但他并不赞成以武力占领这些地方,因为“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绝域……以争碛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所以,“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sup>[37]</sup>武则天时吐蕃没有什么“叛”之行,所以并不打仗,但如果叛也会“伐”的。但在唐玄宗时,吐蕃有如此非“伐”之不可的举状,才不得已而伐之,何谓“穷兵黩武”!今人金吉祥也说:“民族战争,归根到底,只是民族间经济交往基础上的表现形式。吐蕃和唐的战争,也不例外。”<sup>[38]</sup>这种民族战争算不上“穷兵黩武”。

#### 四、历史的反思

由史观今可知将来。唐代有“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两次堪称封建社会经济政治高度发达的顶峰标志。但从实际历史情况上,以史反思,以史启示今,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开元盛世”在唐代诗人(尤其是晚唐诗人)的诗中成为一种永远值得怀念的美好记忆,如杜甫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

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但开天时期已经潜伏了许多政治、经济上的危机,这在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甚至《赴奉先咏怀》、《丽人行》等已屡有预示担忧,这里不赘述。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机?约略观之,无非以下几端:

一、兵制之变迁:唐初兵制按《通鉴》载,武德时期,“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sup>[39]</sup>太宗打高丽时,因兵力不够,也曾想把年轻人也并为“丁”去打仗,《通鉴》载:

右仆射封德彝奏:“中男虽未满十八,其躯体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sup>[40]</sup>最后,太宗为维护唐制,终于接受魏征之劝谏。因此,绝没有《兵车行》中“十五北防河”的十五岁就服役之情况。

那么,那时太宗主要靠什么兵打仗呢?陈寅恪认为:“其(太宗)所用之兵,主力部分必非‘不堪攻战’之府兵”<sup>[41]</sup>而在当时,由于均田制没有被破坏,例行征兵又能严格地按制度征,二十一岁为丁才充役,所以民间不致于导致民怨沸腾,生产也没有遭到破坏。而到武则天后,尤其是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旧唐书》:“宇文融密奏吏部侍郎卢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玄宗只是责卢从愿“不廉”而已,并未加以处罚,事情不了了之。<sup>[42]</sup>正因为这样的态度,使权臣们有恃无恐。而“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随之遭受破坏”。府兵制一破坏,无兵源只好募兵。“隋及唐初虽然经常募兵,但当时府兵之制尤在,兵士虽有来自募者,亦有来自兵府者”,但府兵制一破坏后,“兵源也就仅限于招募了。”<sup>[43]</sup>招募不来的就只好硬征了。于是有《兵车行》与《前出塞》所描写的惨况。这是唐王朝的一个政治教训。府兵制的破坏由于均田制破坏,而均田制之所以受破坏又由于吏治不严,贪官丛生。

二、蕃将任用之变迁:本来唐王朝统治集团主要为关陇集团,任用蕃将纯属正常。但“太宗未用蕃将以前,其主要兵力寄托于所谓‘山东豪杰’集团”。<sup>[44]</sup>

任用的蕃将,按《旧唐书》载:“国家武德、贞观以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峻、张说、萧嵩、……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sup>[45]</sup>于是当将的只是蕃人,这样他们因无文化入相之理由,但“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sup>[46]</sup>由此可见,唐太宗时用蕃将,不专任大将,这样,大将不会有嫡系部队,要以下犯上不容易。但到天宝后因李林甫深得玄宗宠信,蕃将任用才发生变化。蕃人专任大将,不入相,对李林甫是没有了威胁,但专任的大将,必然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加上如果不是“忠孝”类的,(当年忠孝有且才略的阿史那社尔等,太宗任用时有分寸的)如安禄山能聚兵造反即是鲜明一例。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任用姚崇为相,张说为相等,才有开元盛世,到任用李林甫,沉溺于女色之中,荒于朝政,才有《兵车行》那样的“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惨。这无疑也是政治上令人深思的教训。如果说李林甫是“口蜜腹剑”,杨贵妃是“祸水”,难道玄宗没有责任吗? ■

### 【参考文献】

- [1][2] 转引自(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中华书局,1979-10,(卷二):113,118.
- [3] 程千帆等.杜诗集大成说[J].被开拓的诗世界[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12.
- [4] 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04:437.
- [5](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 215 上)[M].列传 140(上).四夷传总序略.中华书局,1975-02 月:6019.
- [6][7] 新唐书(卷 43 下)[M].志第 33(下).地理志七,1113.
- [8] 新唐书(卷 216 下)[M].列传 141(下).吐蕃传(下),6106.
- [9][23](唐)杜佑.通典·边防典(卷 197)[M].突厥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1:1070.
- [10][11] 新唐书(卷 216 上)[M].列传 141(上).吐蕃传(上),6075.
- [12](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 140)[M].列传 90.韦皋传.中华书局,1975,(5):3822.
- [13] 新唐书·南蛮传·南诏传(卷 222 上)[M].列传 147 上,6274.
- [1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2.中篇:134.
- [15] 朱东润.杜甫叙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4.
- [16][38] 金宝祥.吐蕃的形成、发展及其和唐的关系(下)[J].西北史地,1985,(2).
- [17] 旧唐书(卷 199 上)[M].列传 149 上,东夷传·高丽传[M].5328.
- [18] 旧唐书(卷 104)[M].列传 54.歌舒翰传[M].3211.
- [19] 新唐书(卷 225 上)[M].列传 150 上.逆臣传·安禄山传,6415.
- [20][41][44] 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C].金明馆丛稿初编[M].三联书店,2001-06:300-301,297,299.
- [21][45][46] 旧唐书(卷 106)[M].列传 56.李林甫传[M].3240,3239,3240.
- [22][24][2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16)[M].中华书局,1956-06,天宝六载十二月条,“上以仙芝为四镇节度使”,6887,天宝八载四月条,6869,天宝十载四月条,6906.
- [25][2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51)[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1,兵志(三),1321,1319.
- [26][34] 新唐书(卷 50)[M].志第 40.兵志[M].1320,1324.
- [29][30][31] 袁英光.关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几个问题[J].唐史学会论文集[C].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09:143.
- [32][33] 资治通鉴(卷 212)[M].,玄宗开元十年八月条,6753.
- [35] 资治通鉴(卷 216)[M].天宝八载夏四月条,6894-6895.
- [36][37] 旧唐书(卷 89)[M].,列传 39.狄仁杰传,2889,2891.
- [39][40] 资治通鉴(卷 192)[M].武德九年十二月“上遣使点兵”条胡注,6027,6027.
- [42] 旧唐书(卷 100)[M].列传 50.卢从愿传,3124.
- [43] 杨鸿年.唐募兵制度[J].中国史研究,1985,(3).

【收稿日期 2007-05-21】

【责任编辑 吴庆丰】